

财经
学术文库



过渡经济学

GUODU JINGJIXUE

与中国经济

YU ZHONGGUO JINGJI

宋承先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项目获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宋承先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为作者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复旦版)教科书配套出版的,旨在对怎样有分析地批判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探索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一得之见。论文提出了与国内外普遍流行的关于中国经济截然对立的观点,诸如我国改革是以“菜篮子”工程作为价格改革突破口,配套进行企业改革和全面改革之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是价格改革制造出来的“成本推进”,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改革开放以前货币过多的“需求拉上”等。作者在《人力资本价值论——“世纪之争”的一个综合或假说》一文中,提出了90年代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现代劳动价值论。论文说理简洁明了,逻辑严谨,行文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大专文化的读者都能看懂。

自序

汇编在这里长短不一的 28 篇文章,反映了我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看法。它基本上形成于我在 1985 年 3 月 27 日一次关于形势和对策的小型理论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积极准备着手进行国营企业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这一市场导向之核心的基础性两大改革,相应地配套进行计划、投资、物资分配、财政税收、金融、劳动人事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1987 年 9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 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全国到处兴起了经济建设新高潮,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坚决的极其迅速的贯彻实施。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一份可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相媲美的伟大的历史文献。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社会生产力具有两重性,即自然技术属性和社会历史属性的观点,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论述,我在本书第一篇文章中提

出,作为探索揭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生活(有用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必须以人的欲望,包括饮食男女的官能之欲,金钱财宝的物质之欲,以及权力功名地位的追逐欲,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或逻辑的端点。其余文章完全按照撰写时间排列。为了反映作者思想发展的原貌,完全根据本人当时手稿付排,未作任何修改,除了那些未能或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与读者见面的以外,其余的惠蒙出版单位同意重印于此,谨致谢忱。

汇编在本书的论文,原拟作为拙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附录,因篇幅太长,决定另外成书,与该书一起问世。正如我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作为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一本教材,……。作为向我国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的一本教科书,本书如有任何特点的话,是在适当的地方,用对比分析的形式,陈述了我学习《资本论》的一些心得体会”,诸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微观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生产(供给)理论和消费(需求)理论等;宏观经济学方面涉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理论、货币流通公式的理论、国际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等。汇编在本书的论文的目的有二:一是对于怎样有分析地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于我有用之处,敬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二是拙文提出了与国内外普遍流行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不同见解。诸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价格改革作为突破口配套进行其他改革;价格改革最好以“菜篮子”工程作为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并不是[匈]科尔奈根据匈牙利经验科学地总结出来的“短缺经济”的“资源约束”,恰恰相反,而是存在着十分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亦如 30 年代凯恩斯的和战后“日本奇迹”的“需求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完全是我们有计划地逐步调高最后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和矿产品基本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成本推进(Cost Push)造成的,

是价格改革绝对无法避免的现象；与所谓信贷“失控”的货币总需求超过了潜在总供给的需求拉上(Demand Pull)通货膨胀毫不搭界；中国与价格双轨制配套的“双轨过渡”的改革，我认为并不是国内外普遍认为的“渐进改革”，而是“激进改革”，或者更简明的提法——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我还论证了假如把价格改革的过渡时期设计为10~20年，与其配套的“双轨过渡”的渐进改革的过渡时期，最少必须长达20年之久，这就一定会像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那样，出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周期为6~7年的“改革周期”：活而乱的繁荣阶段3~4年，稳定停滞的萧条阶段2~3年；论证了苏联、东欧等国的改革为什么一度受挫迟早必将实现既定目标；等等。最后，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一自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以来的“世纪之争”，在综合马克思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价值及其表现形式市场价值量与瓦尔拉一般均衡论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价值论”，亦称90年代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条件下的现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上云云值得商榷之处，敬希批评指正甚感。

重新读罢全书，突然发现，本书内容可以简括为：论证我国价格改革及其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完全是“成本推进”，而不是改革开放前，根源于“投资饥渴”引致的货币供应量过多的“需求拉上”。L·克莱茵《凯恩斯革命》中有一句名言：经济理论无非是把常识搞得玄乎难懂。所以，只要具有大专文化的读者，不妨从后面先挑选一些二三千字的短文，细心看看，一定能够读懂。

宋承先

1996年2月1日于上海

目 录

马克思、斯密、凯恩斯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
价格改革的理论、步骤和对策.....	(12)
对价格、信贷和储蓄等问题的几点意见.....	(18)
对当前宏观控制的几点意见	(23)
关于宏观控制的若干理论问题	(38)
我国宏观调控的若干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	
——改革十年的反思	(53)
我国的潜在生产能力与通货膨胀.....	(102)
我国的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	(117)
我国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	(130)
四论我国宏观调控的若干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	
——改革十五年的反思.....	(142)
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比较研究	
——中国改革的国际意义.....	(184)
当前经济热点之我见.....	(196)
关于中国通胀前景问题.....	(200)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	(205)
控制通货膨胀之我见.....	(235)
也谈米勒建议我国修路.....	(246)
试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250)
对“经济过热”论的评论.....	(263)

“休克疗法”、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	
——兼论我国当前控制通货膨胀·····	(278)
再论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	(301)
中国通胀是“成本推进”不是“需求拉上”·····	(315)
谈谈我国的通货膨胀·····	(322)
人力资本价值论	
——“世纪之争”的一个综合或假说·····	(326)
对一元论劳动价值论的评论·····	(375)
中国改革经验的“过渡经济学”意义	
——改革开放十六年的反思·····	(379)
“泡沫经济”与中国改革开放：	
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扬弃需求拉上通胀教条·····	(408)
腾飞的东方巨龙	
——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之谜》读后感·····	(419)
“菜篮子”颂：价格改革的两个为什么·····	(424)

马克思、斯密、凯恩斯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是一篇结构松散、逻辑不严密、行文随便的随笔。它是围绕两个问题取材行文的。一是试图说明,我国当前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领域配套进行的改革,不仅可以取得比资本主义经济差不太多的经济效率,特别令人万分兴奋的是,它还会带来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第二是针对明年即将开始陆续出台的近期改革措施,谈几点具体的但又只是原则性的想法。

一、本文使用了似乎有点标新立异的标题旨在说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示的基本原理,把“七五”计划的构思和方针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措施贯彻到底,可能只需要10年左右或稍长一点的时间。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在形式上确实与发达国家(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十分相似:两者都存在着集中决策的计划协调(或指导)和分散决策的市场调节。但是,西方经济学50年代以来提出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sis),把上述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增长地相互靠拢、混合成长、“趋向同一”,显然是混淆了两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本质差别。有鉴于此,如果从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的角度下定义,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称为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简称为分散决策的计划经济,以别于传统的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或者换一种说法,国家计划的拟制和贯彻执行的全过程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按照这样的定义,指令性价格和指导

性价格都是计划价格应是不言而喻的,另一种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成交价格也是中央计划当局所指定的。并且,市场供求力量本身,也是中央计划当局严格控制住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这两个数量指标所决定的。

二、同封建社会比较,资本主义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奥秘何在?答:这与农奴比奴隶必然有更高劳动生产力同出一源。正是无产者的“两个自由”提供了生产力主体为了生存和改善生活这种本能要求而竭尽其所能的客观条件。不错,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无底贪欲又加上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推动了资本家积累资本,并在其经营活动中降低成本,改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但是,资本家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贪欲只是他们主观愿望和为此而设计出的一套计划,要把愿望和计划变成到手的利润终究要靠他们雇用的工人为他们拚命干活。意味深长的是,享有“两个自由”的无产者的存在,恰恰给资本家榨取到最大限度利润提供了最有效的物质基础。铁的饥饿纪律迫使无产者出卖自己所有的唯一的商品—劳动力给雇主使用;无产者的人身自由意味着他有权在众多的雇主当中自由选择他们的买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无产者得以把他的劳动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另一方面,不同的行业和工种有不同的工资率,因为工资决定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在计算劳动力价格时,复杂劳动要换算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再者,相同的行业和工种是按计件工资的原则来支付工人提供的劳动量的。由此可见,在一个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积累之所以得以高速发展,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可以归结为两条:竞争的环境和无产者的人身自由。鉴于社会生产力具有两重属性,即自然技术属性和社会历史属性(亦可称生产关系属性),因此,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产阶级的最大限度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最大社会效益的同义词语。这使

我想起了马克思在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发展进步时的一段话。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竞争，从人道的立场看确实是残酷无情的，劣者会被淘汰，小鱼会被大鱼吃掉。但是，马克思在批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同时高度赞扬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科学立场，指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上面引述马克思的大段文句是想表达本文作者的如下想法：

（一）竞争，是无情的。例如，为我们国家的积累作出了艰苦的重大贡献的农民，这几年一下子大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有一小部分今后在与搞活了的国营企业竞争中会被迫关、停、并、转，一些农民又要成为“隐性失业者”，看来是难于避免的。在当前的机构改革和劳动合同制与企业破产法逐步实施后，有些人将在或长或短时期内处于待业状态，以及收入差距要立即明显地拉开，都是难于避免的。但是，从社会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来看，这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更趋向人道的原则。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总是赶不上资本主义，决定性原因在于我们将不得不以在经济效率方面作出一点牺牲为代价，来换取收入分配方面的较多的公平和合理。一个和尚能够痛饮两桶甘泉，两个和尚只能分享一桶河水，三个和尚可能无水可喝，还是让每个和尚“自负盈亏”为好。就连体育竞赛这类事情，假如得冠军与得亚军完全一样，有益于“人”的个性发展的体育水平的提高，一定是很慢很慢的。

（二）公平的竞争本身蕴含的“自由”，好像也是“人”性执着追

求的东西,姑且不说有人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在与残酷的自然斗争中,他的能力越大,在自然面前的自由越大;而在向自然斗争的人际关系(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劳动者的自由越多,他与自然斗争的能力越大。农奴的劳动生产力比奴隶高,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超过农奴千万倍,证明了这一点。哲学上的与自由王国等同为一的有点抽象神秘的“必然”,与实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等领域中的“自由”,从辩证法角度来看,是统一的。关键问题是在因果链条中,后者是前者之必要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没有后者充分的发展,永远飞跃不到那个理想的彼岸。亚当·斯密在伦理道德领域中赞扬同情和友爱,但在经济生活中却歌颂自私自利,反对封建社会的特权和垄断,鼓吹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建议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挥动它的指挥棒。所有这一切,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来说,应是高明的意见。在“利己”与“利人”这个问题上,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看来不仅在逻辑上是内在地一致的,并且是很高明的。在这一点上,斯密不愧是位辩证法大师,虽然这位逻辑学教授只是先进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三)我还想从以上两点得出如下推论:与高度集权的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部门所有制”,是与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逻辑地内在一致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因而作出了应有贡献,彻底骂倒并非实事求是。但是,现在还不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就是非理性或反理性了,因为它损人害国而并不利己。总结历史教训,从有效率地配置生产资源看,10亿男女的“婚姻大事”,封建家长式的包办婚姻,任何圣明的家长怎能保证不搞出“乱点鸳鸯谱”的笑话?何况许多大小家长们并不精明,有的还是十分愚蠢的,此其一。其次,在我看来,劳动力这种东西,本来是我一旦呱呱坠地天生属于我自己所有的,我自由地选择对象与之结婚,我猜想马克思也会赞成这种合理的要求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我自由选择

劳动场所以维持生命这样的权利,也能说是“自由化”吗?

三、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即可供利用的生产资源,按照社会需要所规定的比例而被分配使用于不同的途径,基本上是在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的。这种微观水平的“无政府状态”(或称“无序”),在宏观水平上恰恰相反地是“有序”的。假如不是这样的活,资本主义早就进入历史博物馆了。马克思曾特别强调指出,按比例分配使用社会总劳动于不同途径,是任何社会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不同的社会只是借以实现这一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迥然有别。

不错,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会周期地爆发经济危机。战后危机更加频繁,70年代中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众所周知,周期性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历史上可算是“宏观失控”的现象有两次,一是30年代的世界性大危机,二是70年代的“滞胀”。两者共同的内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两者之直接的原因或外在的根据和条件,用凯恩斯使用的术语来表达,前者是“有效需求”不足,后者是与之恰好相反的“有效需求”过多。既然无论“有效需求”不足还是“有效需求”过多,资产阶级国家都已经对付得了,有效需求过多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样棘手的问题,有些国家只用了一两年时间便轻而易举地彻底制服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微观搞活以后,即使出现了暂时的“宏观失控”,只要找出病因,对症下药,是一定对付得了的。1985年初曾经使人忧心忡忡的“宏观失控”,不是一场虚惊吗?的确,如果说,怎样搞活微观,我们已经有了众所周知、大家认可的万应灵丹,那么,要做到宏观协调,活而不乱,就要复杂得多。宏观协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艺术。它很像高明的中医医师一贴药方,五味俱全。相生相克,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上边行文是想得出如下隐含的推论:宏观控制这个在理论和

实践上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神秘奥妙的,单凭经验摸着石子过河也能够找到恰当途径的。西方国家,特别在英国,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间,也曾经由于没有摆脱传统的信条而吃过一些苦头。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确实已有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并且形成为几家争鸣的几个流派的理论体系可供参考。率先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和失误之处,只要真正找到失误的原因,更值得借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说:“如果改革者们能以长远的眼光,清醒地看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要达到的更长远的目标,有一个更长远的战略思想,那将是令人十分快慰的。”

四、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想出的一个答案可表达如下:社会主义之所以必须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能搞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其理论基础可能是相似的。由于我迄今还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点,所以我这里只是说相似,以下的论证仅限于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即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目标来看,为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比传统的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更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只要人的本性(意指关心自己超过关心别人)还没有(被某种社会力量)改造成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请注意,这一点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做到了,所以我讲的人性确实是天生的,但又是可以被改造的)以前,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高度集权的产品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越搞越穷。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看来无需讳言,人的欲望,包括饮食男女的官能之欲,金钱财宝的物质之欲,以及权力、功名、地位的追逐欲,是本能性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且“欲海难填”,无底无边。其次,另一方面,劳动不同于打球下棋,在人的本性被改造到把劳动作为自觉的社会义务以前,总是带强制性的。由上两点,我们可以认为,人的无限的欲望与实现欲望的手段这一对供求矛盾,是推动社会生产力

和人类社会辩证地向前发展的最最根本的矛盾。解决这一供求矛盾的方案有两种：一是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的方案，即消极地限制需求以缓和供求矛盾：它劝说人们自觉地限制其无边的欲海，并且声称，只要“我为人人”，就是“人人为我”了；另一种方案是人的本性所制定的方案，即积极地扩大供给的办法。

现在，让我们根据扩大供给这一目标来对比分析大量实践已证明的产品经济的缺点和商品经济的优点。首先，任何社会的资源之有效率的配置，要求做到：从既定的需求出发，使供给的比例最有效率地恰好符合需求所规定的比例。任何计划当局，不管汇集了多少圣明的智者，您怎样去掌握贮存在亿万人头脑中的变动万千的关于需求的信息？您怎样判断出什么人最适宜于做某种工作？怎样能够驱使每个人出勤又出力？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当局，尽管确实是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承认，您是力不从心，会把好事变成坏事的。有的同志坚持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并把它明确地具体化为必须保留行政性的指令性计划。这些同志是把必须保持的供求平衡在实际生活的复杂性简单化了。以钢为例，它是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必须用指令性计划来管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钢并不是一种产品，而是几百种产品。钢的直接需求者有成千种产品和千万家大中小企业，间接需求者包括每餐必备的大米和面包。如此复杂并且变化万千的关于对钢的需求的信息，计划当局用什么方法去掌握它？没有掌握需求的信息，怎样给钢铁厂下达指令性计划？改用产值指标，质次价高的大量钢材占用着仓库，迫切需要的钢材则万分紧缺，改良的办法带来更大的浪费。双轨并行的办法，投机倒把和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是很难消灭的。此外，价格定死了，厂长经理千方百计（包括弄虚作假）为之奋斗的目标只能是完成产值指标。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发展新品种等等利国利民的事情哪个愿意干？完不成指令性指标要丢掉乌纱帽，开发新产品，吃力还可能赔本。再说，按照国民经济平

衡表(这也只能是静态平衡,在实际的动态过程中肯定不平衡)下达的一整套实物、资金和信贷指标,似乎是供求平衡了。但是,长期的投资饥饿症,以及采购员满天飞和大量胡子工程等等现象,正是明显的在投资方面的宏观失控。旧的东西肯定不行了,改良的办法可好?也不行。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并不是因为引进了市场因素,而行政性控制不完善引起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旧的东西在思想和实践这两个方面还起着主导作用,而替代它的东西未能配套出台的必然结果。既然向后看肯定不行,停下来意味着向后转,更糟糕,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就是宁肯冒一点点可能会有风险,向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条崭新的道路,积极而慎重地奋勇前进。不要担心“天下大乱”,计划当局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办法,是足够驱使亿万个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们服从您的指挥棒的。我们的计划当局的这根指挥棒,其实就是斯密推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现在为我所用了。

以上论证的是,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与自然斗争这个问题来看,为什么抛弃集中决策的产品经济,有分析地借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有用的东西,是明智的。它虽然大谈抽象的人性,甚至把所讲的人性作为立论的基础,其结论看来是被中外古今大量事实所验证的。但是,人与自然的斗争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所以还必须进而考察人与人的关系,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形式的供求矛盾需要设法解决。如果说,人的物质之欲可以指望终究会趋近于饱和状态,那么,权力功名地位之欲,就总是粥少僧多,供求矛盾十分尖锐的。怎么办?让我们设想一家工厂的一个车间。车间主任位子应是该车间的大多数人们多少有点兴趣的,因为管人总比被人管好一点。怎样解决这一供求矛盾?办法很简单,①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大家公平竞争;②连选可以连任;③但力不从心也请您让位。这样一来,为民作主的发号施令的官,就变成实实在在的为民效劳的公仆了。您想管我吗?可以,但请您先为我服务。这样一来,

这三条很简单的竞争规则,就把民主、自由和效率这个三位一体的东西,从“人”执着地追求的理想,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和拿到手的東西。似非而实是的是,正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而辛勤劳动,恰恰大大地有助于逐步减轻“一切向钱看”的几千年形成的邪恶的私欲的份量,并且有利于逐步树立起为社会利益而工作和生活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和献身精神。

五、价格结构调整问题。第一,切勿把主动调高农副产品价格和一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价格,跟由于钞票太多引起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等同为一。假如每个成员的收入也都同比例提高一倍,等于是改变一下货币的名称,例如,现在的1元人民币在1954年以前是1万元。问题是价格变动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收入来源不同,所以一定是有人受益,另一些人受到损失。例如农副产品提价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农民由此受益,反之农民使用的生产资料提价而农副产品价格不变,则农民由此受到损失。又如物价水平提高,银行存款人受到损失,而作为债务人的银行(实际上是发行钞票的国家)由此受益,因为他们取出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了。其次,又因为每个家庭消费的物品结构不同,物价变动使每家受到的影响会不同。例如喜欢吃肥肉的人,在不久前的猪肉本身各部分的价格调整中会得到好处,而喜欢吃瘦肉的人则由于这样的变动受到损失。这里涉及的价格理论的基本常识和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是众所周知的,讲清楚这个道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所以,在今后调高价格过程中,不要害怕调高的幅度太大,也不要怕涉及的商品太多。权衡利弊,较好的办法不是走碎步,而是跨几个大步走完全过程。生活费指数即使一下子提高,譬如50%或更高,也没有什么关系,相应地贴补工资就行了。第二点,切勿把我们主动调高一些商品的价格并同时相应增加工资,同西方国家物价螺旋形上升的通货膨胀等同为一。引起后一种现象的始发因素是工资上升,并且一定必须有相应的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当我们主动调高价格并